

中国侗族教育史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委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侗族教育史

主编 杨朝富 王先琼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委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侗族教育史 / 杨朝富, 王先琼主编;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委会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367-7024-9

I. ①中… II. ①杨… ②王… ③中… III. ①侗族—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中国 IV. ①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635 号

| | |
|------|---|
| 责任编辑 | 车树清 |
| 装帧设计 | 李维冉 朱晓虹 |
| 出版发行 |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5楼 邮编: 650032) |
| 邮 箱 | ynbook@vip.163.com |
| 印 制 | 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16 |
| 印 张 | 24.5 |
| 字 数 | 500千 |
|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6年3月第1次 |
| 印 数 | 0001 ~ 1000册 |
| 定 价 | 188.00元 |
| 书 号 | ISBN 978-7-5367-7024-9 |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委会

主 编 杨朝富 王先琼

副主编 龙连荣 傅安辉 卢仕忠 杨通尤

吴英坤

编 委 杨胜溢 陆德高 杨天锡 姚本智

吴常光 伍苍远 陈映星 张 勇

杨代兴 龙涵楨 陆仕安 康心一

1995年3月24日至25日在贵州省黎平县召开
《中国侗族教育史》编写座谈会



1996年6月27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召开
《中国侗族教育史》审稿会议



1996年11月20日在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召开
《中国侗族教育史》审稿会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批准通知

教科规办(1991)33号

韩达 同志:

您申请的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教育史 学科规划组评审通过，领导小组批准，已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并拟推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因国家重点课题的确定尚需时日，故暂无法最后确定此课题的等级。按领导小组的决议，如此课题不能列为国家重点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将被列为 部级重点课题，课题组可据此安排开展研究工作。课题资助经费待确定课题等级后一并下达。

对该课题的管理，执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暂行办法》(待发)。

特此通知。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办公室

1991年11月16日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证明

由中央教科所韩达同志申报主持的国家“八五”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多卷本)其中《侗族教育史》由贵州教育学原谭律佑、黔东南州教委杨朝富、黔东南民族师专龙亚萍等同志编撰，请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司

EDUCATION DEPARTMENT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关于对《中国侗族教育史》书稿的审定意见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侗族教育史》(韩达主编)书稿，经我司组织有关专家审阅后，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了侗族教育史，该书稿掌握了侗族教育的特点，结构整齐、材料充实，已达到出版水平，同意专家审稿意见(附后)，请根据专家审稿意见修改出版。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关于对书稿 《中国侗族教育史》的审读意见

云南民族出版社:

你单位送审的书稿《中国侗族教育史》，经审读，图文未发现有违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的内容，可以公开出版发行。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013年11月23日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总序

韩 达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各族人民携手并肩，经过长期的自然斗争、社会斗争，共同开发锦绣山河，缔造了漫漫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除汉族外，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分布地域却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他们大多居住在偏远边陲，沿东北边陲逆时针转，直至台湾省，略呈“C”形绵延而布；内有跨国而居民族31个。这种地望分布，决定了少数民族在保卫和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拓通内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鉴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地讲，边疆逊于内地，少数民族逊于汉族。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好广袤的民族地区，做好边境工作，对于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意义。可以说，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就不可能实现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

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的振兴，民族的昌盛，应以教育为本。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曾在1983年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战线任重而道远。出于培养民族人才的紧迫感，毛泽东早在建国伊始就明确批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民族教育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此，古往今来都较滞后的民族教育，更当奋起直追。

值得注目的是，民族教育既有不少相通于全国教育的共同规律，也有许多独守不群的特殊规律。这些特殊规律，是自千百年间形成赓续而来，必有其历史的、现实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从这一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对于全面鉴古观今、深入研究和掌握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发展及其规律，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无视或忽视这一点，必难找到堪称“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完整的脉络，自然也必难写出科学而完整的《中国教育史》。而问题正在于，实际情况却

未能尽如人意。少数民族教育如此纷异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迟迟未有必要的考察、研讨和反映，实属历史的失误和偏颇。

我们感到庆幸，当今中国教育界或教育史学界中，许多有识之士业已达成上述共识。早在1979年冬，中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决定组织力量研究、纂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

然而，偿还这笔不轻的历史旧债，却非易事，纂修任务经年累月难以落实。作为中国教育研究战线的一名老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我深知，偿还文化领域的历史欠债，带有抢救性质，迁延日久，难度逾甚。为此，我自1990年起，毅然发动并组织先期筹划。经奋争两度寒暑，至1992年6月25日，人们企足以盼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经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立项，正式获准上马。当时，上马经费拮据，人力不济。我旋以耄耋之年，奔走全国各地，求得各方支援。于是，这一光荣、艰巨、浩大、系统的民族教育研究工程，终于赫然启幕。

如上所述，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向来发展不平衡；而其教育史的研究，更是底子薄、起点低，普遍滞后。不少民族的教育史研究，既无古典文献可考，也乏口碑访录可稽，只能从头做起。如，云南学者承担的该省独有11个民族的教育史，即为破天荒的滥觞之作。如此开拓性的教研巨制，从初稿构架撰写，到稿文一统整容；从史料鉴别筛选，到成稿审定把关，其繁其难，又曷可胜言哉？须知，上马只解决了硬件难题，而更难的是上马后的软件障碍——民族教育史的若干学术问题。举其大端盖有：

一、关于民族教育分类

教育类型的划分，对于一般的教育史来说是并不困难的；而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极不平衡，教育发展千差万别，其分类却难统而划一。

要在民族教育史纂修中，对其多彩教育进行科学分类，恐需通横达纵，就差论别：既看历史横断面上各民族的教育水准，又看各民族历史纵剖面上的教育进程，经纬交织，而以“史”贯之，酌予特殊的厘定。基于同样原因，加之可考文献资料甚少，这种厘定难免语焉不详，只能粗略为之。鉴此，我们便从“大教育”出发，循“各族史”而行，爬梳为如下诸类，即：原始社会残余形态的原始教育，奴隶社会形态的初级文明教育，封建社会形态的多元教育，近、现代学校的正规性教育，革命根据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学校规范化教育，等等。

在古往的历史纵面上，各民族受中央政权的管辖情况颇多不一，其教育所受辖制和影响亦大相径庭：按王朝一统要求兴教授业者有之；循本民族特有模式自行其“教”者有之；王朝一统教育与民族模式并行不悖者有之……纂修民族教育史，既应沟通现行《中国教育史》，更应着眼于各民族特有的传统教育，诸如：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劳动教育，立足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生活、风习、德行教育，伴随不同意识形态

的宗教信仰教育，以及服从特殊生存发展需要的畜牧、射猎、征战的骑射教育，等等。这些教育，多以社会实践和家族传承形式为之，或以学堂（学校）、寺庙授业等渠道进行。其中，表现为“以育人立世为主旨，以目染耳濡为能事，饱涵自群色彩的整体社会的日常教化”，在各民族教育发展中，沛然各扬其长，尤为重要。作为民族特色的教育，自当着力书之。

在现、当代历史横面上，革命根据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灿然一新的民族教育。从“量”的规模来讲，它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翻倍增长，乃至零的突破；从“质”的品类来讲，它实现了跨越一个或几个世纪的历史性升华，走上了真正的人民教育之路和科学的民族兴教之路。作为民族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建国后更相继创办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广西、广东、贵州、西藏、东北、西北（第二）等民族院校，首开民族高等教育之先河，使民族教育终于全面跻身多层次、多学科的现代规范化教育之林。民族教育如此壮丽的长足跃进，更当椽笔浓墨，大书特书。

二、关于历史分期

这里所说的“历史分期”，是指《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与现行《中国教育史》的历史分期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断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各少数民族地区并存着多种社会形态，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溯至农奴制、奴隶制，乃至原始公社末期，几乎史有尽有。其发展进程，普遍后于内地汉区；其结构也异常复杂，极不平衡，甚至同一民族因分布地不同也殊异。这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略同汉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如回、维吾尔、苗、壮、布依、朝鲜、满、侗、白、土家等30余个民族，蒙古、彝、黎等族之较大部分，以及藏族之小部；二是尚存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如藏、傣、哈尼等族之大部或部分；三是尚存奴隶制，如大、小凉山的彝族；四是尚存原始公社制残余，如傈僳、佤、景颇、独龙、基诺、怒、黎、高山、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之部分或小部。他们的政治制度复杂纷繁：有的辖从于历代中央王朝；有的则各自为“政”，如西藏藏族的“政教合一”、凉山彝族的“家支”、西双版纳傣族的土司制度和残存原始公社制民族的“长老政治”，等等。

各民族如此杂沓的历史进程，实难划一于中央王朝的历史分期。相应地，其教育史的历史分期，就只能从各民族实际出发，分别酌处：凡能参照朝代史划分者，按朝代史记述；否则，按大的年代史、世纪史划界；上溯数百、上千年，社会形态无大的质变，查无明确断代界限者，则统称曰“解放前”的教育发展史。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民族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本书力求如是，也只能如是。

三、关于地望分布

这里所说的“地望分布”，是指本书如何处理各少数民族地望分布，与历代中央王朝行政区划的关系问题，亦即民族教育史的地望定位问题。

时间是空间的历史；空间是时间的地望。史、地如影之随形，密不可分。修史必涉地望。各少数民族的分布状态，历来十分复杂。纂修各族教育史，必须弄清其社会活动地望。而各族活动地望却变迁无常，有的尚可观照历代的行政区划，有的则因区划史料过略或遗缺而无从考究。鉴此，本书只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为基准，按其行政区划去大体指代某族彼时活动之彼地。其中，在历史上曾一度或一再迁徙者，逐次注明其变迁路线，庶几与《中国教育史》的地望同步对接。

我国少数民族的地望分布，宏观可谓“大杂居，小聚居”，自古而然，鲜见例外；微观细而分之，可胪三类：一是大集中、小分散，如蒙古、回、藏、维吾尔、壮等族；二是小集中、大分散，如苗、彝、布依等族；三是全民族聚居于一、二省区的局部地域，如裕固、独龙、鄂伦春、基诺等族。就人口布局而论，55个少数民族中，除大部分聚居边疆和民族自治地方外，还有回、满、蒙古、朝鲜、苗、瑶、畲、土家等民族的约1000万人杂居、散居在全国各地城乡。

针对上述民族分布状况，除聚居一地者外，本书均以其集中部分为研究主体，解剖麻雀，略窥其概；同时兼采其分散部分之特色精华，以周其全。如，蒙古族教育史，以内蒙古的蒙古族教育为主体，兼及青海、新疆等省区；壮族教育史，以广西的壮族教育为主体，兼及云南、广东等省。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堪称民族教育的特中之“特”。如，双语教学手段、寺庙经院教习、多元文化影响，以及民族心理濡染，等等。本书则按特殊矛盾作特殊分析，或略或详，或聚或散，平实、审慎地记述之。

上述学术问题，经编委及作者各方悉心研讨，锐意攻错，现已大体化解。尤为幸者，率先成书、尚带试编色彩的这些书稿，业已得到各方人士的热情肯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审稿，明文鉴定道：书稿“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历史，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在资料缺乏，可资借鉴的史料不多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绩是可贵的。它们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某些方面的空白，均达到了出版水平”。书稿相应的一些民族地区，还专门举行学术讨论，赞之为该“民族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有的民族地区，还授之以“科研一等奖”。

卷帙浩繁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先行出版的凡三卷，约550余万字。它涵盖了蒙古、回、藏、维吾尔、彝、壮、布依、朝鲜、满、瑶、白、土家、哈萨克、傣、黎、高山、东乡、纳西、达斡尔、佤、羌、毛南、保安、裕固、京、基诺等26个民族的教育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一卷，收集了《回族

教育史》《维吾尔族教育史》《朝鲜族教育史》《满族教育史》《哈萨克族教育史》《东乡族教育史》《达斡尔族教育史》《羌族教育史》《保安族教育史》《裕固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二卷，收集了《蒙古族教育史》《藏族教育史》《彝族教育史》《白族教育史》《傣族教育史》《纳西族教育史》《基诺族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三卷，收集了《壮族教育史》《布依族教育史》《瑶族教育史》《土家族教育史》《黎族教育史》《高山族教育史》《仫佬族教育史》《毛南族教育史》《京族教育史》。暂未列入的其余29个民族——苗、侗、哈尼、傣、佤、畲、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布朗、撒拉、仡佬、锡伯、阿昌、塔吉克、普米、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族的教育史，敬祈民族教育战线等有关单位，继续组织专家、学者纂修，以使本书能囊括全国55个少数民族古今教育的发展丰姿。

平心而论，本书的纂修出版，对于中国民族教育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学界，必将作出显著的贡献。首先，它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学科体系，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现行中国教育史的一大空白。其次，它有利于弘扬少数民族教育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深入进行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再次，它从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出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决策的依据。此外，它还锻炼了一支少数民族教育史的科研队伍，增强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后劲。

这部异彩纷呈的教研巨制，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付梓在即，我格外难忘各方仁人对本书的参与和扶持；广东、云南、广西三家教育出版社慧眼高瞻，始终鼎力支持出版；山东曲阜市巾被厂孙钢梁厂长等，热心民族教育，慷慨出资匡助；京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民族教育战线诸多领导、管理干部，争相奋袂应援。没有他们殚精竭虑的参与和扶持，断无今日之成就。我还要特别提及，陈声远、李彦福、韦善美、孟作亭、张为珍、栗洪武、赵一兵、熊明安、冯春林、马加林、李耀宗诸方家，为组织、撰写和支持出版，倾注殊多辛劳；国家民委教育司组织专家审稿，严格把关，体惜入微。在此，请让我一并鸣谢！

古语云：“始生之物，其形必丑”。本书旷古“始生”，舛讹欠当之“丑”，或不鲜见；文稿通贯之失，在所难免，令人喜中隐忧。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恳请广大读者、同行不吝赐教，俾既出之卷日臻完善；也恳望有关省区人员等，协力有加，修竣未就之卷，以使本书早日完璧。

序（一）

梁旺贵

侗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56个民族之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良好的教育。

侗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远古南方的百越民族，与其中的“西瓯”“瓯越”“骆越”关系更近。西汉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广西柳州、桂林、三江，湖南省怀化和贵州黔东南一带就已经有侗族聚居，史称“峒蛮”。北宋时在沅阳县北记载有侗族居住，史书出现了“侂伶”（又称“仡伶”）的汉字记侗音的侗族自称称谓。后来许多史书府志记为“干”“更”等等。辛亥革命时，始有“侗人”“侗族”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这一族群共同体正式确定为“侗族”。

侗族形成于唐宋时期，后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明清时期，侗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民国时期，侗族社会和全国一些民族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民族学者对侗族进行考察，认为侗族最初有过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经历。从原始社会跨越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又经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解放前，侗族只有语言，还没有发展到有文字的阶段。但是，侗族的记事和治安文化源远流长。比如：打草标，就是用草打标记来举证表达诉求意愿；栽岩，就是双方或多方共同栽下高高的岩石，用以划清山界、水界、村界、路界等等，以石为证，共同遵守，互不侵犯；立款，就是用汉字记侗音或汉字汉文写下村民或各方村寨共同议定的乡规民约，颁布执行；祭萨，就是祭祀女始祖“岁”。通过一年一度举行盛大的祭萨活动，使全体族人敬畏族魂，遵守族规，减少纠纷诉讼，同心同德，和谐共处，谋求地区的长治久安。在传承记事和治安文化中，歌师、巫师、族长、寨老、款首等属于民族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侗族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在使用汉字汉文，这也削弱了创立自己民族文字的必要性。

侗族地区的传统教育，主要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发轫最早，存在最久，积累的经验也最丰富。随着侗族地区与内地汉族地区交往的

密切，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在侗乡落地生根，并迅速得到兴旺发达。唐代就有王昌龄到侗族地区的龙标县创办龙标书院开办教育。北宋王朝在侗族地区设立了“州学”“新民学”“鹤山学院”等等，以“招生讲学”“养晦读书”化及地方。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开办的“府学”已经遍及全国广大侗族地区。民国时期，国家教育部在侗族腹地——贵州省榕江县创办了一所边疆师范学校——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内地知识分子纷纷躲避战乱来到大西南，促进了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县中学大多是这段时间兴办起来的。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内民族一律平等，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侗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58年，国家帮助侗族采用拉丁字母创立了侗文，从此，侗族有了民族文字。20世纪80年代以后，侗族地区的学校试行双语文教学，有力地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还惠及扫盲取得大成效。

在贵州、湖南、广西、湖北四省区侗族地区教育行政领导和广大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在杨朝富等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下，编撰出《中国侗族教育史》一书的书稿，洋洋50多万言，这是他们心血浇灌的结果。书的初稿于1996年先后在广西三江和贵州玉屏召开了审稿会，一致认为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书籍。

宝贵的遗产值得继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侗族教育史》记述了侗族教育的历史发展情况，其中有前人的不少成功的教育经验，这对发展今后侗族地区的教育可以起到史鉴作用。同时，要办好侗族地区的教育，那么，现代化的教育经验应当很好运用，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也应当充分借鉴。这样，才能使侗族地区的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人才的竞争。教育不普及，国民素质就提升不高，人才质量就受到影响。所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中国侗族教育史》的编撰和出版，对发展侗族地区教育来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乃不朽之盛事也！此为序。

1997年12月15日

(作者：梁旺贵，男，侗族，1930年生，贵州省从江县人，时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序（二）

粟海亮

《中国侗族教育史》的出版，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朝代侗族地区文化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了解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这是侗族人民的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好事，可喜可贺。

侗族是一个只有民族语言而无自己文字的民族，直到1958年才在国家帮助下运用拉丁字母拼音创造了侗文。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侗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化，创造了许许多多适合于本民族需要的教育方式方法，用款、歌、故事、谚语等形式，传承着本民族可歌可泣的事事情情，激励着侗族人民的子子孙孙，使侗族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很强的攻坚克难的斗志，自力更生，生生不息。侗族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教育的民族，特别在明清时期，重视对后代的文化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侗族人家的共识。历朝历代，侗族民间教育的许许多多的成功经验，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并发扬光大。

但是，由于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本民族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无法用文字记载下来，只能言传身教，世代相传，局限性很大。因此，侗族人民的智慧不能得到很好提升，更难以发展，抑制了本民族创新能力，使得侗族在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不能成为较发达的民族。虽然各个历史朝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也曾派一些文人到侗族地区去兴办学校，有汉族的许多仁人志士来到侗族地区兴办书院传授汉文化，侗族的许多有识之士也竭尽全力发展本民族的各种教育，借以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但是，到1949年解放前夕，侗族地区仍然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文盲，这就是侗族地区教育状况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获得解放后，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加大教育的投入，派了大批外地的教育工作者来到侗族地区任教，又就地培养了一大批侗族的教育工作者，从事侗族地区的教育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侗族地区的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现在，侗族地区的教育，是有史以来最兴盛的一个时期了，

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朝代无法比拟的。但是，与全国教育发展水平相比较，侗族地区的教育仍然差距很大，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很不相适应。虽然是发展中的差距，但是，也说明了我们侗族地区的教育工作仍然存在很多做不够的地方，要使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赶上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与各方面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的确任重而道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重视了教育的民族，其发展会驶上快车道。相反，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会永远落后的。实践证明，文化教育落后，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发展落后反过来又影响文化教育发展滞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汉文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的交流工具，我们讲侗族的教育，主要是汉文字的教育。过去不少历史朝代的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侗族地区文化教育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侗语和汉文的不统一，又给侗族人民学习汉文带来很大困难，则是另一个客观原因。新的时代，已经有了改变落后的条件。我们要分析、研究那些制约发展与进步的原因，充分用好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采用新型的教育方式方法，努力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质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侗族人民政治上翻了身，得到了平等，但是，仅有政治上的平等而没有经济、文化上的平等，那还不是真正的平等。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文化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就要经过几代、十几代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教育工作者和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抓住文化教育不放松，加大文化教育的投入，竭力赶上全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紧紧依靠全体侗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依靠侗族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艰苦努力，大办教育，培养人才，重视人才，用好人才，进一步搞好侗族地区各方面的建设，才能使侗族跻身于经济科技文化先进民族的行列，也才能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实现真正事实上的平等。

1997年6月12日

(作者：粟海亮，男，侗族，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